

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

广言之,我国的经济学到走出困境,必须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但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上,必须慎而又慎。

■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针对当时情况,写了一本书,叫做《哲学的贫困》。当今的中国,经济学也处于贫困的境地。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这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或思想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只有 200 多年的历史,这当中,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唤起民众,反抗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反对资本的殖民政策,争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确起了重大作用;对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也产生深刻的和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 20 世纪,推动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及其建设事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和理念,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为之而奋斗的美好和幸福社会,鼓舞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确功不可没。时至今日,大凡有良知的人们,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做出不朽贡献的了不起的历史伟人,就连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也非常尊重马克思,把他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和“千年伟人”等活动中,马克思仍荣登榜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思想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自然成为他们的不朽之作。

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情况下仍存在一些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仅哲学贫困,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传统经济学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十分严重。传统经济学的贫困在当今的社会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传统的经济学的体系已经支离破碎,难以照旧维持下去。虽然目前还有些人仍在苦口婆心地说教和修补,但从实际上看,似乎逐步被冷落了,或被淡化了;二是现代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更谈不上完善和发展。

传统经济学贫困在我们教学实践中,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不论我们在学经济学还是在教经济学过程中,所奉行的都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意指一定群体认同的或约定的理念)。所谓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就是指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几乎完全是从《资本论》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社会主义部分除了是从前苏联教科书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外,甚至还把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某些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始终。几十年来一惯制,年复一年,年年复制“古董”。从过程和结果上看,我们较长时间被教条主义所愚弄了,我们又不自觉地以此来愚弄别人。

改革开放后,对传统经济学虽然有所认识也有所改善,但进展很慢,成效甚微。

前些时候,在我们大学中,曾流行这么四句话,很能说明问题。这四句话是:教学和研究人员“东倒西歪”;使用的学术用语“东拉西扯”;学生“东张西望”;一些学者“东奔西走”。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贫困”,是有它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的。

传统经济学贫困,首先与它的研究对象一成不变有关。社会生产就其原本意义上讲,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传统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只研究前者,或者说是以前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这种研究对象定位可能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息息相关。传统经济学为的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寻找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发动工人阶级并联合一切劳苦大众起来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如今,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不是埋葬资本主义,而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传统经济学没有很好回答或根本没有回答。

其次,传统经济学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马克思时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

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许多从未见到和未想到的东西,诸如:发轫于 20 世纪中叶的新科技大革命和科技大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错综复杂的金融体系和网络关系;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等等。正因如此,马恩著作中的有些观点不能说在今天都还是有效的。正如上述,任何理论,都不能认为绝对和永远的正确,无需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这些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身后的人类社会提供一切现成的答案。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从未对未来社会具体的发展过程作过任何无根据的预测和判断。

再次,传统经济学的贫困,不能不承认与我们一贯奉行的左倾路线有关。左倾路线是国际共运的“肿瘤”,在我国也有严重的反应。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因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认定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而只能与它对立,不能与它共融,只能批判,不能汲取。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从传统的经济学的几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走出来的,目睹眼前这种过程和现状,一则为忧,二则为难。说心里话:如果有人不为此而感到难过,似乎没有“良心”;反之之,如果有人仍死抱着传统的经济学不放,或想方设法来复辟旧的体系,这叫做没有“头脑”了。

我国的经济科学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困境,不走出困境,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如何走出困境,并走向繁荣和发展?就当前而言,我认为取决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真正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实现理论创新,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咬文嚼字;二是能否广泛地汲取和正确对待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吸收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如一些所谓“权威人士”所说的只能“借鉴”或不能吸取;三是能否用来解决和解释当今世界包括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实践问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提供真正科学的理论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总是以“批判家”的身份出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抱有成见,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公开反对和嫉恶如仇。

现在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体系,只能看做是探索真理过程中的继承,而不是最终的总结。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视野拓宽了,思想活跃了,逐步感到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科学和体系,绝不可能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最高和最后的真理,也绝不可能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进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能力。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而绝不能成为我们只能信仰而不能发展的教条。

在我国经济学队伍中,就目前而论,就倾向性而言,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以中、青年人为代表的倾西方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老年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老年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比较传统的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轻经济学家;还有一派是主张中西合璧的经济学派,其中还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这一派里,老、中、青经济学家都有。我是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结合观点的。

中西结合并不是“半斤八两”,而是以我为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广泛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对我有用而又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学,丰富发展并创造我们新的科学的经济学。

广言之,我国的经济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但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上,必须慎而又慎。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或主流地位不动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坚持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反对在我国学术界中仍严重存在一种霸道的、垄断的学风,这种学风的主要特点,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言必马列,而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教条式地死死抱住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词句、结论不放,而且处处和事事都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把其他学说、学派统统看作“异类”,甚至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蛮不讲理和语无伦次地加以“批判”。

在我看来,在对西方经济学真正认知中,



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汲取的东西,概言之,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重视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实质研究的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生产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力,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经济学如果不研究生产力实际上是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真正的指导作用,放弃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力,不是一般生产力,而是代表时代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不仅要寻求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源泉,而更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先进生产力,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把先进生产力妥善运用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生活和建设中。

其二,要重视对第三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由于当代科技的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产业不仅包括金融业、服务业、商业,还包括领先世界科学新潮流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等,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渗透到消费各领域,全方位地为生产、消费者服务。第三产业如今已经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第一、第二产业并列,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由于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和优先发展,表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防巩固等。正因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不能不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其三,要重视对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主导甚至决定作用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宏观控制是不可少的,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从总体上说,市场调节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并存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应起主导或决定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无处不在,它时刻在利润生产和利润平均化的原则驱动下,自发而又主动和及时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各部门或各企业间之间合理的分配,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生产力。但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它的不足需要宏观调控来补充。有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时间,宏观调控也起主导或决定作用。

其四,要重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定量分析,并汲取其精华。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曾提出,传统的经济科学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因而原用的方法重演绎和抽象。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光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显然不够了。在现代,对于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的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定性分析,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进行周密地观察和预测,更需要直接地进行调节和控制等。所有这些,没有先进的科学工具和相适应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对西方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吸收,还不止这些,但这些都是主要的。

生物遗传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是物种退化的重要根源。理论或学说也是一样。学术上的杂交,优势互补,往往是理论或学说发展和创新的重大原动力。

这里,还必须注意的是,对西方经济学中任何一种文明的吸收,都不能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而必须细心过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实现有效地嫁接,防止不良反应和原机体的排斥,创造出高于前者的更优成果,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从发展和愿景上看,要做到这一点,但必须狠下决心,百折不挠,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和建设,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曲折的,甚至有时是很痛苦的。

其一,必须更加深入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创新和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传统的经

济思想,传统的经济观点,和与其相适应的传统的习惯势力,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根深蒂固,真正要使之在改革和创新中改变过来,绝非轻而易举。在这里,顶层设计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担当意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胆略,创新气度,创新能力,以革命的精神,领导全国人民,对传统经济思想、习俗和势力作有勇有谋的说理斗争。这当中必然有反复。但我很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定可取得实效,直到最后胜利。

其二,必须有效地继续培植、巩固、壮大并提高这支敢于担当历史重任的主流经济学家队伍。目前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涌现了一支重要力量,人们通称之为主流经济学派。早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从灾难深重的计划经济年代走出来的一些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中国今后的道路应当怎样走、于是,主流经济学派在逐步生成和发展。所谓“主流”,主要是因为它能适应时代的呼唤,在对中国旧体制改革中从理论到实践都能起到启蒙和主导作用。在中国后计划经济年代,主流经济学的先驱者,如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已经先后提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可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不了气候,左右不了大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开始,知识受到重视,才逐步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对话的平台,这时政治家需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也需要政治家。因此,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影响到政治家的决策。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起到了奠定乾坤的作用。从此,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思路,才取得了真正话语权。中国加入 WTO 之后,堵死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的回头路。只有这时,主流经济学才起到真正的应有的主导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主流经济学这支队伍不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还不够强大,难以担当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今后,必须从教育、培训、组织等方面,强化对这方面人才的培育。目前,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基础,发展和壮大这支队伍是大有可为的。今后我们每年从高校培养出来的经济理论人才,如硕士和博士,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很少受传统观念的约束,懂得大是大非。还有就是以“海归派”为代表的具有更多西方知识的学者,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技术和机制比较熟悉,这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应当从政策上、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关怀他们,重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之更多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其三,建立和完善一些健康向上的经济学科研究所,及其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从现状上看,新老的经济学科研究所并不少,但其中的大多数,仍旧习惯地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地“复制古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更有甚者,有些新成立的研究所,打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遗余力地继续宣传和推销传统的经济思想。他们研究的不是发展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研究越深入,距离马克思主义越远。从结果上看,他们研究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如何反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呼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破旧立新,创造性地建立和完善真正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服务的有战斗力的科研和教学组织,及其相应的制度和规章,进而保障经济科学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其四,必须深化改革,化解矛盾,为经济学的发展,搭建宽畅的平台。西方经济学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经济改革,并非全都运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而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如分配不公,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污染,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明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不高,体制和机制不完善,贪污腐败,等等。其中有些矛盾还相当突出,如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如社会化服务包括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等)的需要与公共品短缺的矛盾,还很尖锐。本来,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大背景下所呈现出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很难避免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都是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还有的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有些人总是揪住不放,不依不饶,任意夸大,并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否定国有企业改革,否定民营经济等。进而认为,一切改革的错误,都是主流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误导的结果。对于这些言论,除了必要的批驳外,更重要的是,必须继续深化改革,用温总理的话说:“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改革成功了,矛盾克服了,经济科学运作的平台拓宽了,经济科学的巨大作用才能更充分发挥。

其五,经济科学要竭尽全力地为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服务。当前,我们党提出要逐步把我国社会构建成为一个和谐社会。市场经济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构造成和谐的市场经济。如何构造和谐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几千年来,通行一个不可取代的原则,即“优胜劣汰”的原则(也是规律)。既然是市场经济,由于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作用,要人为地废除这样一个原则,是不可能的。但除此而外,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即在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中“优势互补”的原则(也是规律),这个原则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个原则很重要,它和价值规律一起,成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两驾马车”,缺一不可。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优势互补”的原则更重要。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优胜劣汰”的原则,由于受到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限制,作用弱化了,而“优势互补”原则则加强了。用哲学观点看,“优胜劣汰”原则的思想基础是“单向思维”,即“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而“优势互补”原则的思想基础是“双向或多维思维”方式,即“我活你也活”或“我赢你也赢”的思维方式。“我活你也活”或“我赢你也赢”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平等、协商、协和、民主、互助友爱、互利互惠、相互尊重。这种“双向或多维思维”方式及其原则,目前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主要在对外贸易上,普遍地运用着,并取得卓越的成效,得到广泛的好评。今后,为了建设我国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大力宣传、鼓励和运用“双向或多维思维”方式及其原则,并在实际生活中广泛推广之。这就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地方,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及其制度。从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上看,成效是斐然的,是举世瞩目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总之,当前道路已经开通,航向已经指明,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会在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开新花、结硕果。

《经济学家周报》已开通网易云阅读平台官方账号,敬请关注。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